

“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应以经济区为代表建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再进一步发展就是跨区域合作，遵循的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在这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值得研究。”

高等教育现代化前提是区域化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小时候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去某某大学。”很多人童年时，都受过类似的升学刺激。家住广东的余荔也不例外。家长常对她说“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去省内大学”。后来她努力学习，考上了北京高校，但有意思的是，此时高等教育的焦点却悄然转向了粤港澳。如今身为南方科技大学副研究员的余荔心中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面临三大变局

在讨论区域教育的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院校战略规划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周光礼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指出三大变局——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51.6%，步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向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过渡，最主要的变化之一是“高校办学经费的变化”。

高校的办学经费正逐渐从依靠政府向依靠社会、依靠高校自身发生转变。财政部近年也在引导各高校逐步拥有健康的财务状况，希望高校的事业收入占比稳步增长。

在这样的形势下，高校出现了一波新趋势——中西部地区的原“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纷纷南下、东进扩充资源。

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后，大学的形态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第四次工业革命以通信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不少高校都在探索该轮工业革命背景下，大学将产生怎样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从微观层面来看，高校在制定战略规划时，一定要把自身与所处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周光礼说。

在“十四五”期间，国家提出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周光礼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建设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事实上，高等教育要实现现代化、高质量化，首先必须实现地方化、区域化”。

美国相关研究发现，最佳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单位是州，所以在美国“只有州立大学，没有国立大学”，每个州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高等教育体系。

然而，我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有反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区域，以大区为单位建设高等教育体系。每个大区的“标配”是至少有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一所重点理工科大学、一所重点师范大学和一所重点农业大学等。

应该说，六大区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实际上



仍是以国家为单位组建高等教育体系。于是，我国在后来的改革中，加强了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地方统筹为主，开始探索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上海曾想走在这项改革的前列，探索部属院校下放地方。但有些高校很快便“后悔”了，其原因并不复杂，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在政策、人才等各种资源配置上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这就使得以省级统筹为主的改革进展缓慢。

那么，下一步改革要走向何方？

建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世界一流大学和城市是什么关系？国际大都市和世界一流大学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军最近的研究课题。

在研讨会上他指出，以高校、学科为单位的“双一流”建设尚属于初期阶段。“将来，我国的‘双一流’建设还要考虑区域问题——怎样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地，而不只是建成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在不远的将来，“高地”一词也许会变成一个热词。北京已明确提出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广东提出全力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四川提出加快建设西部人才高地。

“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地是国际大都市的特征。”王战军说，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基本上都云集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聚集地。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大学在产业革命和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引擎作用，如深圳等地在开展“交钥匙工程”，给高校提供用地、建筑。但余荔指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得还不充分。

“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应以经济区为代表建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周光礼说，再进一步发展就是跨区域合作，遵循的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在这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值得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唐贤清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区域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已成为衡量区域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探索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对于构建并创新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王战军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多校联合攻关，“未来政府的拨款也很可能是按区域进行，而非按高校、学科划拨”。

湖南大学教授蒋家琼以英国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为例指出，“英国区域高等教育治理给我国的启示是，要发挥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尽管其联合会或协会一开始是自下而上发起，但此后政府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其中就包括经费支持。”

蒋家琼提醒，在这个过程中还应注意培育连接大学与社会的中介组织。在区域高教一体化中，英国的相关协会扮演着三角角色，分别是召集人——举办有影响力的活动、沟通者——为成员提供集体或有影响力的声音、引领者——促使大学与地方合作。我国的区域高教一体化建设可以

加以借鉴。

假设我国将按区域为单位进行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那么它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为什么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需要协作？这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卢晓东思考的问题。

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很多高等学校成为单科性高校，北京学院路地区的多所高校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一背景下，通识教育的互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避免同类型专业建设的盲目竞争、寻求特色发展的需求等因素，成为人才培养需要协作的主要原因。

当下，新工科、新文科建设凸显出对跨学科人才的需求。单科性高校尤其需要学科间的强强协作。“大学之间的这种协作不但要在高校内部打破院系间的藩篱，甚至要在不同区域实现学校间的协作。”卢晓东说。

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促使省级一流学科之间形成人才培养的合作，就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主题。

卢晓东指出，课程和学分在不同高校流动的关键，在于教育财政合理机制的建立，特别是需要按学分收费并进行相互的财务核算，这是合作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

他以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为例指出，暑期学校得以实现并持续发展的原因，在于高校之间达成精准衔接。如1959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就建议，“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使用统一的校历。这样的校历将使教学设施利用率的提高成为可能，也将给各级学生提供最大化的衔接，最小程度地减少重复。”

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着力点，主要有暑期学校和联合学士学位两种形式。其中，后者在新工科、新文科的进程中越来越重要。它的实现根本在于课程的跨区域流动，而专业课程通常来源于两所或更多高校。

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提出，高校不是通过学科专业而是通过课程推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变革的。

“社会需要什么人才，高校就办什么专业，用专业来应对人才需求是永远搞不定的，因为人才培养还需要关注多样性问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常思亮补充道。

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在理论上非常清楚，跨校的辅修/双学位教育、第二学士学位是其中的重要模式。但以上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过程多有坎坷，尤其是第二学士学位在2019年被教育部叫停，又在2020年恢复继续开展。卢晓东提醒，第二学士学位的招生和培养仍然需要区域之间的高校相互打开大门、密切合作。

在常思亮看来，高校在推动学科交叉的改革实践上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观念创新不足，高校人事评价激励机制缺少协同性改革，导致高校特别是院系学科交叉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

种种困难和新时代的新要求，都需要我们抓住当下战略机遇期，积极改革。王战军认为，机遇非常宝贵，需要格外珍惜。

“我们是等着破产，还是通过颠覆性创新去赢得教育的未来？”

不久前，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七周年会的一场分论坛上，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西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席西民的提问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曾有美国学者预言，有一半的美国大学会在未来十五年内破产。此话一出，有人认为这是哗众取宠。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在2013年~2014年间有3211所学校，随后几年中迅速减少了好几百所学校。

“这样的命运会发生在我们的学校身上吗？”席西民问道。

在这场以“营造教育新生态”为主题的年会中，不乏学者对我国教育的未来提出自己的担心甚至警示。而面对未来，如果真的想“营造教育新生态”，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幸，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多人正在思考。

我们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今年6月，上海纽约大学创校校长俞立中正式退休。虽然已经不在“一线”，但他并没有停止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在此次论坛上，他便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的问题——大学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此前我看到很多报告都在强调大学的社会功能——为各行各业培养接班人。”俞立中说，大学教育的社会功能确实很重要，但不要忘记，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俞立中坦言，在教育中，只有人的潜力得到发挥，其价值得以实现，才能真正体现立德树人的功效，教育的社会功能自然就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很多关系还没有摆正。”他认为，大学教育首先是培养一个人，尤其在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今天，大学教育对于人自身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此，民建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也在发言中表示，“以人为本”虽然不是新概念，但在今天仍应该成为教育的主题。“教育应该从学会知识回归到关注人本身的发展。”

既然如此，大学教育应该培养一个怎样的人呢？

席西民表示，如果人们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学习，使学习成为终身按个人兴趣不断积累的过程，那么一定会出现三种人才。

“第一种是在某个领域有一定造诣的专家；第二种是在某个领域有领导力的行家；第三种则是有能力的工作者——即使成为不了行业或专业精英，也可能拥有某方面能力，追随自己的兴趣，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乐趣。”席西民说，基于这样一个思考，教育要给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带来重大作用，就一定要培养能够在全球背景下进行全面竞争的人才。“我们将其称为世界公民。”

席西民坦言，一个人要想成为“世界公民”，除了要有健全的人格，还要有极强的行业背景，以及跨文化的领导力和创业家精神。“这种人可能成为行业精英，经过一定的发展后，变成业界领袖，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前两种人。但即使成为普通人，教育也应该使他们过上幸福、有追求的人生，至少使他们成为有能力的工作者。”

只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的教育该怎样做呢？

培养模式该如何变革

一方面，大学需要思考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而另一方面，作为大学培养目标的学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而在三亚学院院长陆炜看来，这种变化使大学陷入了一场“危机”中。

他表示，随着网络社会的形成，学生对个性化成长的需求已呈爆发性增长，其表现之一则是课堂学习热情不高，其主因并不是学生的热情或精力被其他因素诱惑。大学应该反思，自身供给的学习内容是否真的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广而言之，大学现有的教育观念、理论制度以及技术虽然具有系统性和优先性，但其权威的唯一性还在吗？”陆炜问道。

如果大学不能就其在知识、技术、能力的传授和获取等方面的唯一性进行自证，也就无法阻止大学生的学业分心。

对此，席西民表示，适用于未来教育的教学模式，一定是扁平化、多元、融合、分布式的。“未来选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品牌，而品牌的背后则是这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你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是否符合未来的世界需求，是否能够帮助他人走进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这是很重要的。”

作为上海纽约大学的创校校长，俞立中在这所国内首家中美合办大学中工作了8年。其间，上海纽约大学也建立起了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俞立中将其总结为三个核心要素——

首先是学会选择。在上海纽约大学，学生的选择机会很多，而且很多是基于学生自己的志向和兴趣的选择。学校十分重视学生选择能力的培养，给予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其次是学会学习。该校力图使学生摆脱听课考试的模式，让学生感受到学习是无所不在的，能够利用各种学习资源，主动学习。

第三是学会思辨。即重视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不设标准，强化阅读、思辨、表达的训练。“这也是上海纽约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中贯穿的核心内容。”俞立中说。

“大学创新难点归根结底还要回到大学个性化培养人才的难题上，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又必须回到教育的原点。”陆丹说，在这方面，他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们仍在探索之中，而这种探索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是教育者的职责所在。”

如何应对新技术挑战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发展轨迹。疫情催生的网络教学技术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应用，也引发了人们对技术在教育变革中所起作用的思考。

在发言中，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周国平表示，今年的疫情凸显了互联网的优点和不足。其优点很明显——没有互联网，今年的学校教育就会停摆。有人据此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即网课可以取代或大部分取代实体教育。对此，周国平并不认同，因为各校的实践也暴露了网络教学的某些不足。

“比如，网课没有实体教育的现场感和亲密性。”周国平说，在课堂上，学生与老师之间是有现场互动和情感交流的。老师看着学生的眼睛讲课和对屏幕讲课，师生双方的感受都不一样。

“事实上，我们目前应该考虑的不是网课能否取代实体教学，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实体教学，让它成为新生态中的良性基础。”周国平说，以自我教育的能力为例，目前我国的主体教育形式，从教育理念到课程师资、测试方式、评价体系都是应试导向，这导致学生始终在为应试打工。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学生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承受力的大小和应对如何。这种状态下，自我教育是无从谈起的。”周国平说。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助理总干事唐虔也表示，对许多学生而言，进入大学是希望感受学校的学术氛围、社会交往。因此，未来的线上教学和实体教学需要一个平衡。“另外，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激发建立学习型社会潜能，并试图利用新技术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还应研究保障弱势群体不会因为掌握不到新技术而再次被边缘化。这一点也应该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唐虔说。

「营造新生态」的三个本质问题

■本报记者 陈彬

从“心”出发，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宣传舆论战“疫”

■邹立娜 魏长林

今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我们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北京化工大学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守舆论阵地强信心，创新传播方式暖人心，汇聚战“疫”合力筑同心，有效激发了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精气神，为疫情防控工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自信心和原动力。

坚持正确导向，坚守舆论阵地 一锤定音“强信心”

一是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学校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等平台及时发布党中央、教育部、北京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筑牢思想防线。打造北化线上理论课堂“微课

堂”，基层党支部结合实际，通过微信群、线上会议等多种方式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抵制网络谣言，及时纠正不当言论。各党支部积极探索网络政治理论学习的的形式，各内容和新媒体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理论学习的新效能。

二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化身权威信息“播报员”，让真相“跑赢”谣言，向教师、科研人员、学生、校友等不同群体发布倡议，引导师生员工听从指挥，统一行动，不信谣、不传谣，坚决做谣言的“抵制者”和“终结者”。坚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起来，同疫情防控现实背景结合起来，凝聚爱国正能量，传递战“疫”好声音，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

三是掌控正确舆论走向。加大疫情防控期间网络舆情监管力度，实现网络舆情监控24小时

不间断。及时了解掌握师生的思想动态，建立疫情防控期间舆情会商机制。充分发挥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党员等网络宣传引导员的功能作用，主动发声、正面引导，教育引导师生员工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防控工作初期，学校党委组织部策划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示精神内容13篇次，宣传防疫法规、普及防疫常识内容39篇次，发出号召倡议5篇次，很好地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聚合媒体平台，创新传播方式 聚焦一线“暖人心”

一是“线下+线上”，创新采访报道方式。学校采取线下策划、“云端”采访的工作模式，变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报道为精准化的“个性化”传播，聚焦一线，着眼基层，推出了140余篇“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报道作品，极大地增强了师生员工抗击疫情的必胜决心。

二是“传统+新兴”，搭建立体化宣传平台。开设疫情防控专题网站，累计发布疫情防控信息500余条。坚持移动优先、融合传播、多点推送，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开设“战‘疫’进行时”专栏，讲好北化战“疫”故事，共发新媒体推文150余篇次，累计阅读量达145万次。其中，“北京化工大学师生同开开学第一课”五平台线上同步直播，同期网络浏览量就高达69.4万人次。

三是“四力+融媒”，提高信息传播效能。学校在不断增强宣传舆论工作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同时，充分发挥融媒传播优势，采用图片、文字、音频、视频、H5等形式，打造“一次采编，多平台使用”的“采、编、发”一体的中央厨房式报道形式，借助手舞舞、手写祝福、合唱等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防疫知识，讲述战“疫”故事。

联结校园内外，汇聚战“疫”合力 携手共谋“筑同心”

一是整合资源，构筑内宣“同心圆”。整合校内各单位和学生组织平台，针对不同受众统一策划、统一选题、统一采编、差异化成稿，分众化发布，构建了“全媒体作战、全天候回应、全方位报道、全介质呈现”的战“疫”大宣传工作格局。

二是畅通渠道，奏好外宣“协奏曲”。积极畅通外宣渠道，主动发声、及时回应，传递正能量，唱响北化战“疫”好声音。《人民日报》等社会主流媒体报道学校疫情防控相关信息达174篇次。

三是守望相助，讲好战“疫”“同袍义”。加强与兄弟高校战“疫”宣传合作，与兄弟高校合作录制原创MV《白衣城墙》，仅微博播放量就突破140余万次；联合八所行业类高校共同发起“化”为一体，齐心抗“疫”、为武汉高校加油”等活动，为湖北兄弟高校加油鼓劲。

四是选树先进典型，持续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推出战“疫”进行时“师说心语”“青语咨询”等专栏，采访师生先进典型，事迹报道52篇次。学校主页面在及时发布党和国家重大活动、重要理论创新等内容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发布学校重大科研成果、重要评优获奖、重要工作部署等。